

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

孙 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6866

C955.2

92

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



孙 强 著

C955.2
92



北航

C17251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孙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61-3636-2

I. ①晚… II. ①孙…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2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项目成果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建设费资助

(302)		附录
(302)		附录
(302)		附录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国民性话语实践的基本语境	(21)
第一节 文明论视野中的国民性	(21)
第二节 国民性与民族主义	(37)
第二章 国民性与民族国家想象	(49)
第一节 奴隶批判的政治与历史含义	(49)
第二节 国民:国民性的批判与重构	(62)
第三节 作为国民性的“国家”	(78)
第三章 国民性与民族文化认同	(94)
第一节 政治与文化视阈中的“种族”论	(94)
第二节 民族文化认同的策略与矛盾	(107)
第三节 国粹:关于民族与文化同一性的思考	(124)
第四章 国民性与个人观念	(140)
第一节 失败的政治、个人观念的认同与反传统	(140)
第二节 文化选择的可能与儒学化的个人主义	(165)
第三节 个人观念与乡土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184)

结语	(202)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21)

导 言

一 研究缘起

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变迁与运动中，国民性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国民性几乎成了劣根性的代名词。在人们的脑海中，对民族素质的检视，对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是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和方式。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中，晚清至五四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欧洲的殖民扩张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天下主义思维图式的衰落，代之以“世界历史”的景观，“中央之国”被拖入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格局。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性转换中，中国开始了它的“现代”之旅，“国民性”是被镶嵌在这一段历史中的重要问题。有关国民性话题的热烈讨论渗透着改变历史处境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与一种从西方启蒙知识的立场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迄今为止，对这一历史话语的研究与认识，主要有三种解释方式：第一种，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观念的支配和影响，认为国民性是一个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范畴。讨论中争议最多的是如何处理国民性和阶级性之间的关系。对国民性的历史实践，既肯定国民性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又认为它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民性提法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第二种，从启蒙或现代化的立场出发，认为改造国民性话语的意义在于启发人的自觉，推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第三种，与后殖民理论的出现和介入有关，认为国民性理论及其话语是西方种族主义的产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屈从于这种殖民主义话语，这是一种被迫接受的话语或知识。这一看法将欧洲历史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与种族主义挂钩，强调中国的国民性话语是对前者的挪用与移植，是一种东方主义话语的颠倒。如果说启蒙或现代化的解释视野使近现代的国民性话语失去了它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后殖民批评对“起源”的怀疑发现了中国国民性话语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话语之间的某种历史性联系，却因此消解了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价值。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鲁迅的批评尤其如此。

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后起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性范畴提出质疑。受阶级观念的影响，陈独秀认为“国民”实际上并不存在。最突出的是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邨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确实代表了病态的国民性，解剖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村和都市里民众的思想，作为时代的记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强调十年来中国的农民早已不像那时农村民众那么幼稚了，认为中国农民已经拥有充分的革命性，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钱杏邨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从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鲁迅的《阿Q正传》，一方面认为他是国民性的典型，也有许多论者从阶级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他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新中国成立之后，除鲁迅的国民性问题受到关注之外，近现代的国民性问题则被视为禁区。

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中期，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的国民性问题上。尽管经历了消长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时期研究的角度见解也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首先是对“国民”“国民性”概念的探讨。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民”一词含有阶级的内容，指不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国民性”则指人民大众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指全中国人，国民概念包括各阶级的人，既包括压迫者，也包括被压迫者，“国民性”即“民族性”。第三种观点则持完全否定的意见，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是不能说成是国民性，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即使同一阶级的人也不一定有一种思想。也有论者对民族性和阶级性做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身上既

有阶级的烙印又有民族的特征，二者是互相渗透的，国民性概念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研究。“十七年”间，认为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国民性问题是鲁迅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期提出来的，产生的原因是基于爱国主义和个人经历，目的在于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十七年”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研究，虽然也肯定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但主要是作为前期思想的局限性来认识的，国民性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这种局限性主要是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鲁迅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依然采用阶级论的方法和立场。但论述的重点有所变化，注意从鲁迅思想主体转变的历程来看待国民性问题，认为国民性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鲁迅在阶级斗争实践和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增长，国民性思想逐渐减弱了，直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国民性问题的解释，其中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总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和抽象的理论出发，把丰富复杂的国民性问题放在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中分析，认为国民性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范畴。正如何其芳指出的：“理论应该去说明生活中存在的复杂现象，这样来丰富自己，而不应该把生活中存在的复杂现象加以简单化，这样勉强地适合一些现成的概念和看法。”^①马克思主义的国民性问题研究，由于主要强调阶级论的合理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忽略了国民性范畴的理论意义以及具体实践的历史价值。

20世纪80年代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刘再复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对人的重新思考，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展开的，带有“形而上”的特点。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启蒙人的自觉意识，重塑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国民灵魂。^②启蒙主义的国民性研究认为历史的终点是个人的自觉，近代历史是一个批判理性不断成长的目的性过程，国民

① 转引自陈漱渝主编《说不尽的阿Q》，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96页。

②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性话语被视为一个从救国到救人的历史过程。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当时民族灾难过于深重，民族“救亡”的实际要求太迫切，因此，先驱者们便纷纷地转入实际的革命实践活动，把精力放在救国的实际行动上。知识分子的这种抉择，正是一种民族责任感的高度表现，但由于他们转入实际行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民族弱点的思考也就匆匆结束，对人及历史文化的形而上的思考也无法深入。刘再复等人论述与评价的逻辑显然来自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启蒙叙述相呼应，近代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现代化。汉语学界比较早地建构关于中国的现代化论的当属金耀基。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成为历史研究的崭新范式，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国民性话语也就被视为人的现代化过程问题，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求人在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基于制度信念表达的理论，国民性话语自然被视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现代化理论，都对解释近现代历史中的国民性话语发挥了相当的效力，但是，对这些范畴的运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甚至困境。李泽厚在为救亡压倒启蒙感到惋惜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①在五四的思想世界中，无疑存在个体精神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但汪晖认为，从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前提和冲突本身的特征看，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对抗”，“中国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① 因此，把国民性问题看作单纯的启蒙，并不能真正说明国民性话语的动力，以及在中国历史实践中所具有的特质，而不同历史阶段国民性探讨的动机目的及其意义，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对现代化理论的借用，则把现代化看作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现代化理论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它负有维护自由世界制度理念的责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理论比韦伯的现代概念更加抽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把现代性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出来，并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时空而言，这种模式是中性的；此外，它隔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现代化理论就产生的背景而言，是冷战的产物，是基于西方制度信仰的普遍化表达，西方中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近代历史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过程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其动力来自何方，它和西方的现代化有何不同？总之，启蒙主义或现代化研究中对“现代”的信仰掩盖或忽视了对历史过程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理论的局限和化约历史的做法都需要重新思考。进一步讲，国民性话语的历史实践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内涵，是一个理性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权力与知识共同交织参与的过程。

如果说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化约历史的做法，把国民性看作一个不容怀疑的范畴，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成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后殖民批评则关注历史现场，认为国民性理论是欧洲中心和种族主义的产物，西方的中国论旨在为欧洲建立种族与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被征服者的发言

①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8页。

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中国的国民性实践是被迫接受的结果。^①后殖民批评引发了人们对国民性理论作为知识范畴产生过程的关注,为思考国民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刘禾从后殖民批评和跨语际实践理论出发,把中国的历史实践看作是对西方话语的借用和模仿,但对两者之间的历史内涵却没有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她所操持的理论反而限制了她对历史的真正理解,她的结论也成了某个理论的牺牲品。那么,国民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理论,它来自何处,是不是所有的西方关于中国的论述完全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非西方的国民性话语实践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国民性话语提出质疑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萨义德认为欧洲有关东方的陈述是一种“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②萨义德把西方对东方世界所持的态度和方式,以否定的含义称为东方主义,批判了以殖民主义为背景的西方知识界的态度,批判了他们的东方主义话语。首先,国民性理论是不是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呢?国民性理论的诞生与东方主义并无必然的关系,不能把它和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直接等同起来,它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休谟等人都曾热衷于讨论民族性,启蒙思想家相信应该更理性地治理国家,让所有人都幸福。一方面,启蒙思想家用其他民族的优越性来抗衡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他们认为欧洲的优越性是科学和理性,而不再是宗教;同时,尽管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众多的特点,或不同的进步程度,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假说使他们相信世界是统一的,文化的多样性不会阻碍统一性,通过各种不同的实践和长时间的积累可以最终实现。超越民族多样性的普遍主义认为人类的本质是统一的,历史理性和超越时空的文明概念成为进化论者的信念。因此,“历史哲学不再是政治哲学的附属物,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② [美]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而成为整个政治哲学的主干内容，处于启蒙思想的中心位置”。^①从伏尔泰到黑格尔，他们都热衷于历史哲学的建构，对民族性与统一性的关注成了启蒙思想的特征之一。所以，国民性理论就其起源而言，是和启蒙思想的普遍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和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不同，浪漫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提出了民族文化的理念，赫尔德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最全面最深刻的表达方式，从中可以体现出民族的灵魂。对民族灵魂的强调，后来形成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各个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形成了普遍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对立，关于国民性也有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一般精神和民族精神。因此，国民性理论本身并不是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产物，而是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的产物。

由于启蒙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些普遍的文化标志，自18世纪晚期以来，国民性研究成为欧洲自己追求进步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教养是该民族走向现代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所谓教养则指所有希望进取的民族应该公认的一些价值观。在论述国民性的英国作家中，重要的有两位，塞缪·斯迈尔（1812—1904）极力倡导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他列举了理想的民族性，如讲求实际、忍耐、勤劳、进取、勇敢、独立等，主要著作有《自助论》（1859）、《性格论》（1871）、《节俭论》（1875）、《责任论》（1880）等，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另一位是巴克尔（1821—1862），其著名的《英格兰文化史导论》以富于争论性的实证方法，促使不少时人以科学方法考察文化史和国民性。他们分别总结出了理想的国民性的构成及获得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著作剖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性，探索历史事件或其他因素是否影响了国民性的形成和培养理想国民性的途径，他们甚至相信，完全可以预测国民性的形成。^②其实，国民性理论的独特之处不是它本身，而是历史实践中所发挥的功能。欧洲在进步论的历史叙述中把国民性看作是进步的方式之一，但是，当他们对欧洲以外的民族的国

① [法]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6页。

② 鲍绍霖：《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的三部曲》，《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民性进行评价的时候,表现的态度和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们对自己和别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西方中心意识使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后殖民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它的批判功能,然而,对非西方世界而言,国民性实践的意义应做何解释呢,能否说是对西方的模仿和借用呢?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主要涉及中东地区,并且在讨论的题旨上仅限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依然采用了东方主义的分析路线,从使用的资料看,更加广泛,包含了欧洲人关于非洲、印度远东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加勒比地区的著作;从论述的意义上看,对现代西方宗主国与它在海外领地的关系作出了更具普遍性的描述。从《东方学》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义德的论述从单一化的批评呈现为更具张力的复杂模式,提出了一个以前并没有论及的主题——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反抗。殖民地的反抗不仅表现为武装斗争,政治上以民族独立为目标,还体现为文化抵抗运动和对民族属性的诉求。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实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对殖民主义话语的借用和模仿。相反,它主要是对民族属性的自觉追求和文化抵抗活动,具体方式表现为从西方启蒙知识立场观察中国社会。萨义德也对欧洲内部的反殖民倾向给予关注,他认为至少从18世纪中叶起,在欧洲就有关于拥有殖民地利弊的讨论,包括狄德罗和孟德斯鸠在内的多数法国启蒙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约翰逊、考波、伏尔泰、卢梭等。但是,“在关于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统治的本体论层次地位这样深刻的问题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反殖民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人道主义的论证,认为不应过分严厉地管理或拥有奴隶,多数启蒙主义哲学家,则从未怀疑过西方或白种人的优越性。”^①在此,他区别了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反殖民,但并不反帝国主义及其本身,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回到欧洲关于中国国民性论述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区分启蒙主义的论述和殖民主义论述。

^① [美]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3页。

由于以往理论上的种种局限,尤其受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影响,国民性现在成为很难讨论的问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论述了西方的知识怎样构造东方,却从未真正叙述第三世界文化主体实践中提出的国民性问题,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 国民性概念与理论的历史考察

国民性问题研究的困境不仅来自它与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来自自身的理论构成及其在实践中的变异与重塑。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多达几十种,但就界定的方法而言,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国民性从晚清到五四开始进入中国思想文化界,后来,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学科与制度的建立,国民性遂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范畴。国民性常被界定为:一个民族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和人格类型,^①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的形态,^②并且这种心理特征和人格类型是在长久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反映了某种在民族的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

第二,文化学的角度。认为国民性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改造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③它从人的角度反省民族文化,并通过这种反省开始人的现代化的艰巨工程,即民族性格的改造。^④

第三,阶级论的国民性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持否定意见,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是不能说成是国民性,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即使同一阶级的人也不一定有一种思想。^⑤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民性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什么天生的遗传和根性,而是在以

① 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② 沙莲香:《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③ 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④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⑤ 李何林:《从国民性问题谈〈阿Q正传〉》,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①另外，国民性的主体到底是哪一个阶层的问题，也存在分歧，鲍昌认为，国民性是在某一主导阶级制约下的社会心理，并非各个阶级心理的融合，它也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心理体系。^②邵伯周则认为，国民性可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可以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指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精神形态和思想意识。^③

从以上对国民性概念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问题：第一，对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心理和性格的描述是否可能，阶级论的国民性概念分析认为由于阶级现象的存在，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概括性描述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性是不存在的，只有对某个阶级和部分群体的心理或精神状态的描述才是成立的，并且认为所谓的国民性不是什么遗传和根性，它的形成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应归之为短暂的历史现象。相反，无论是社会心理学或文化论者都相信存在统一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并且具有长久的稳固性和延续性。第二，在国民性概念的使用上，无疑也形成了两种修辞模式，一种认为国民性是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或某部分群体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类型进行描述的概念，一种认为“国民性”专指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国民性因此成为具有否定意义的价值判断。第三，单纯的概念化的界定把国民性看作一个固定的封闭体，无法弥合概念的界定与具体历史实践之间的矛盾与鸿沟，进一步讲，社会心理学和文化论的分析使历史实践中这个主题所包含的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内涵被排除在国民性概念理解的狭隘视线之外，阶级论的方法则成了对历史的颠倒，也就是把历史序列中后发性的概念运用于对前发性的思想与活动的解释。

三种类型的概念探讨固然有各自的学术思想传统和历史语境，但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无法摆脱自身方法论上的缺陷，在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② 鲍昌：《论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③ 邵伯周：《讨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见解》，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9页。

理论与历史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弥合历史和理论的分裂。这些概念与理论形成的先验逻辑前提，即相信某个主题或概念可以被建构在确定和标准的类型上，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都是一些在结构上和使用规则上各不相同的概念，彼此不相干或者相互排斥的概念，一些根本不能进入逻辑建构一致性中的概念”。^① 国民性问题历史研究面临的难题也正正在此，历史实践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标准化的概念范畴，所以，从方法论上破除现有概念的简单套用则显得非常必要。概念的本身的研究方面，也必须抛弃大家习见的先验逻辑前提，进一步讲，与其试图在概念与理论的历史变化中建构一个一致的系统，不如重视概念与主题在历史中“散布”的系统，注重概念与主题的差异与转换，同时关注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策略和功能上的差异，也就是说注重话语的实践形态，从而建立一种历史的系谱学的方法。下面从系谱学的角度对国民性概念与理论的知识形态在西方的演变和实践功能以及中国的接受与实践做历史性的考察。

国民性概念与理论作为西方的产物有其内在的构造和形成的历史。首先，从孟德斯鸠说起。《论法的精神》作为一本政治社会学的著作，提出了一些一般社会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孟氏认为气候、土壤可以决定人的生理、精神和心理方式，但孟氏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相信严格的地理决定论，他认为一个社会与民族的性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人类受各种事物的支配，那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法则、先例、习俗、礼仪等，由此形成了一个总精神。”^② 雷蒙·阿隆认为孟氏的“总精神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所说的一国的文化，即某种生活方式和共同的形式，而这种方式或形式不是一种因素，而是一种结果，在长期内构成一个社会类型的全部自然影响和精神影响的结果”。^③ 从孟氏的论述与雷氏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总精神是一个由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形成的特定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行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也就是我们

① [美] 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7 页。

②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05 页。

③ [法]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 页。